

汉语词汇史新探
续集

汪维辉 著

浙大中文学术丛书



A NEW INVESTIGATION IN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EXIS: VOLUME II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汉语词汇史新探 续集

汪维辉 著

浙大中文学术丛书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词汇史新探续集 / 汪维辉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308-17220-2

I. ①汉… II. ①汪… III. ①汉语史—词汇—文集
IV. ①H1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4168 号

汉语词汇史新探续集

汪维辉 著

责任编辑 杨奉联 宋旭华

责任校对 王荣鑫

封面设计 小 意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6.5

字 数 574 千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220-2

定 价 10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浙江大学一流基础骨干学科建设计划
资助项目

目 录

汉语史研究中的语料使用问题——兼论系词“是”发展成熟的时代	001
关于基本词汇的稳固性及其演变原因的几点思考	021
论词的“误解误用义”	035
现代汉语“语体词汇”刍论	050
时代呼唤在线《汉语大词典》	073
太田辰夫的汉语史研究在中国	080
语文学的功底 语言学的眼光——研治汉语词汇史的一点心得	092
说“日”“月”	101
说“鸟”	130
说“脖子”	152
汉语“肚子”义词的历史与现状	186
汉语“闻 / 嗅”义词的现状与历史	202
“树”字札记二则	238
说“住”的“站立”义	244
《百喻经》与《世说新语》词汇比较研究	252
《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与《训世评话》的词汇差异	300
汉语中的十组表量形容词	314

《触訾说赵太后》三本异文之比较	346
有关《临济录》语言的几个问题	362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刊刻于南宋的文献学证据 及相关问题	389
《型世言》语言成分分析	398
《高丽史》和《李朝实录》中的汉语研究资料	416
《重刊老乞大》对《老乞大新释》的修改及其原因	451
会话书“《骑着一匹》系列”研究	473
释先秦文献中的“先子”——附论“先君子”	506
“雌黄治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纠正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的一处 疏失	515
《王梵志诗》“心下较些子”的解释问题	519
《朝野僉载》“侯思止”条解读	533
近代汉语中的“~老”系列词	542
“把似 / 把如”的词义与理据	558
后 记	576

汉语史研究中的语料使用问题

——兼论系词“是”发展成熟的时代*

汪维辉 胡波

摘要 正确使用语料是进行科学的汉语史研究的前提。语料使用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语料的选择，基本要求是口语性和可靠性；二是语料的分析，包含确认有效例证、剥离口语成分、分析统计数据和重视典型语料四个方面。文章就这些问题发表了看法，并提出了“以典型赅非典型”和“以前期赅后期”两条原则。通过对唐代一些典型语料的考察，文章认为至晚到中唐时期“不是”已经在口语中基本取代了“非”，系词“是”已经发展成熟。

关键词 语料选择 语料分析 典型语料 以典型赅非典型 以前期赅后期 系词“是”

正确使用语料是进行科学的汉语史研究的前提。语料使用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语料的选择，二是语料的分析。^①两者又是相互关联的。下面分别讨论。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11BYY062)的阶段性成果。最初的稿子曾在2012年4月6日晚上举行的同人学术沙龙上讨论，修改时吸收了大家的意见；友生真大成博士特地从京都大学发来邮件提供了很好的意见和材料。文章初稿在第八届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4.22.—24. 湖南师范大学)上报告过，修改后的主要内容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安徽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及浙江省语言学会第十六届学术年会(2012.12.21.—23. 杭州)上做过演讲，得到多位师友的鼓励和指教，特别是鲁国尧先生提供了具体意见和冯友兰先生的有关论述。《中国语文》编辑部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很中肯的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谢。文中错误概由作者负责。

① 本文主要讨论汉语词汇史和语法史研究中的语料使用问题，暂不涉及语音史。

一、语料的选择

用于汉语史研究的语料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口语性，二是可靠性。（参看汪维辉，2000b）

关于语料的可靠性问题，太田辰夫先生（2003：373）曾经有过经典性的论述：“在语言的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是资料的选择。资料选择得怎样，对研究的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太田先生所说的“资料选择”，主要就是材料的可靠性问题。这一观点已经成为汉语史学界的共识，深入人心。虽然在研究实践中使用不可靠语料的问题仍然时有所见（参看王魁伟，2000；董志翘，2006；麻爱民，2010等），但这主要不是认识问题，而是个人学养或治学态度等问题，这里就不赘述了。

我们所要研究的汉语史就是口语发展史，所以据以得出结论的材料理应是口语性语料。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探索如何依据口语性语料来探明汉语史上各种问题的真相，并做过一些尝试（汪维辉，2000a、2001、2002、2007等），读者可以参看，这里也不详述。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汉语的历史文献虽然无比丰富，但是语言性质却十分驳杂，纯口语资料是很难找到的（朱庆之，2012：203），特别是晚唐五代以前。因此有人会说，在缺乏纯粹的口语语料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带有一些口语成分的语料也是可以而且应该使用的。这话没错，问题是怎样使用。只要我们能对语料做科学的分析，那么理论上一切历史文献都可以用作汉语史研究的资料。

二、语料的分析

蒋绍愚先生（1998）曾经指出：“不但要做好语料的整理工作，而且要做好语料的分析工作。语料有文字讹误、后人擅改，以及时代、真伪等问题，需要通过校勘学、文献学的方法加以鉴别和改正，这是语料的整理。语料本身没有问题，但语料中反映的语言特点有的是时代特色，有的是地域特色，有的是语体特色（如有的很口语化，有的文白夹杂），需要加以区分，这是语料的分析。不注意语料的整理，把有问题的语料作为研究的依据，当然会造成大错；对语料不加分析，把

地域或语体的特点当作时代的特点，在作语言史的研究的时候同样会发生错误。语料整理的问题，现在一般比较注意了，语料分析的问题，还需要特别强调。语音研究方面，已有学者提出‘剥离法’，在语法和词汇研究方面，不少语料也是需要‘剥离’的。只有在正确分析语料的基础上，才能作可靠的语言史的研究。”

蒋先生十几年前说的这段话，至今仍值得每一位汉语史研究者深思，因为在目前的研究实践中，语料分析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语料分析的方法更是有待于大家共同来探索。

我们认为，语料的分析至少应该包含这样四个方面：一是确认有效例证，二是剥离口语成分，三是分析统计数据，四是重视典型语料。后三点又是相互联系的。下面分别论述。

1. 确认有效例证

所谓“确认有效例证”，实际上主要是一个正确理解文意（包括断句和认字等）以避免“假例”的问题。这里试举一例。李焱、孟繁杰（2011）引例多有问题，仅举下面两例：

地气反寒暄，天时倒生杀。（白居易《桐花》）

世间滋味，尝尽酸咸苦涩。时今倒食蔗，无甜汁。（唐致政《感皇恩》）

作者认为其中的“倒”是关联副词，实际上都不是。《桐花》例“倒”与“反”对文，是动词“倒过来了”“反过来了”的意思；《感皇恩》例是用典，《世说新语·排调》：“顾长康啖甘蔗，先食尾。人问所以，云：‘渐至佳境。’”“倒食蔗”就是倒过来吃甘蔗，所以“无甜汁”。只要稍作分析，这种“假例”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正确理解文意是从事文献语言研究的必要前提，而目前的汉语史研究中此类“假例”问题并不鲜见，甚至一些名家也难以尽免（参看汪维辉，1996；史文磊，2008；刘君敬，2008；张海媚，2010；麻爱民，2010；王虎，2012等），限于篇幅，不再细说。

2. 剥离口语成分

正如蒋绍愚先生（1998）所说，跟语音研究一样，“在语法和词汇研究方面，不少语料也是需要‘剥离’的”。语料分析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剥离”，即

把文言性成分和口语性成分“剥离”开来，因为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纯口语资料是不多的，文献语言的基本形态是文白混杂，只有把其中的口语性成分“剥离”出来，才能据此探明历代口语的真相。这个问题下面再结合实例做详细分析。

3. 分析统计数据

定量研究是一种科学方法，在汉语史研究中正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但是科学的方法必须科学地运用才会有效。

目前比较常见的做法是：选取若干种语料，统计其中研究对象的出现次数，然后依据出现频率得出相应的结论，而不管所统计的语料是否具有“同质性”和研究对象所出现的具体语境如何。这种方法可以称为“‘一锅煮’统计法”。这样的实例随处可见。我们认为这种方法是缺乏科学性的，因为它往往难以导出合乎实际的结论，反而会掩盖事实真相。下面举个例子。

王云路、方一新《汉语史研究领域的拓展——评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中国语文》2002年第2期）说：

该书的考证大抵可信，但可商之处也是有的。例如：谈到“愚/痴”二词时，作者说：“粗略地说，上古多说‘愚’，东汉魏晋南北朝主要说‘痴’。”（325页）“在东汉佛经里，‘痴’字用得极多，……‘愚’单用的已不多。”（326页）按：“愚”和“痴”的变化未必如《研究》所说。整个魏晋南北朝，“愚”都活跃在口语色彩浓厚的作品中，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笔者以日本《大正藏》第3、4两卷为随机抽查对象，利用陕西师大历史系袁林先生的检索软件（据袁先生说明，该电子本《大正藏》原始文本来自中华电子佛典协会）作了检索，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愚 第3卷，命中132篇，总共454次；第4卷，命中113篇，总共1113次。

痴 第3卷，命中145篇，总共519次；第4卷，命中103篇，总共536次。

仅就第3、4两卷统计结果来看，“痴”并未取代“愚”，相反，“愚”的使用频率还稍高些。以上统计数字容或有误差，但出入应该不会太大。这样看来，《研究》的结论尚可商榷。

上述统计数字确实对汪维辉（2000a）的结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事实

究竟如何？我们抽查了其中公认为口语性最强的一部佛经——收于《大正藏》第4卷的南朝齐求那毗地所译《百喻经》。该经中这两个词的使用情况如表1。

表1 《百喻经》中“愚”“痴”的出现次数和用法

	总数	愚痴	丨人	丨者	丨臣	丨夫	丨老人	丨鸽	丨猴	丨惑	凡丨	丨倒	丨顽	不丨	丨无智慧	丨无所知	以为丨	反谓他丨
愚	118	12	94	3	2	1	1	1	0	3	1	0	0	0	0	0	0	0
痴	25		4	0	0	0	0	0	1	0	0	1	1	1	2	1	1	1

统计数据显示：“愚”大大多于“痴”，两者的出现次数是118：25。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口语仍以说“愚”为主，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两者的用法：

“愚”虽然多达118例，但没有一例是单用的，用法只有两种：一是充当定中结构的修饰成分，其中“愚人”就占了94例，还有“愚者，愚臣，愚夫，愚老人，愚鸽”，出现频率都不高；二是与其他成分构成同义（或近义）连文，有12例“愚痴”、3例“愚惑”和1例“凡愚”。而25例“痴”中，除去12例“愚痴”，“痴人”只占了4例，“痴猴”1例，单用的却有6例（即上表中“不痴”以下6例）。可见作为一个可以单说的词，“痴”已经取代了“愚”，“愚”则降格成了一个非成词语素。此外“痴倒”一例也值得注意，“痴倒”应是同义连文，“倒”即佛经中常见的“倒见”的“倒”，意思是“颠倒的，错误的，不正确的，愚蠢的”，这是佛经中的一个新义，^①“痴”能跟它组合，说明是当时的口语词。下面是《百喻经》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昔有愚人，头上无毛。时有一人，以梨打头，乃至二三，悉皆伤破。时此愚人，默然忍受，不知避去。旁人见之，而语之曰：“何不避去？乃住受打，致使头破。”愚人答言：“如彼人者，痴慢恃力，痴无智慧。见我头上无有发毛，谓为是石，以梨打我，头破乃尔！”旁人语言：“汝自愚痴，云何名彼以为痴也？汝若不痴，为他所打，乃致头破，不知逃避。”……如彼愚人，被他打头，不知避去，乃至伤破，反谓他痴。（以梨打头破喻）

① 参看汪维辉（2011）“痴—愚”条。

其中“愚”的组合只有“愚人”和“愚痴”，凡是要用单字表达愚笨义的地方都用“痴”，这说明在口语中，作为一个可以独立运用的词，“痴”实际上已经取代了“愚”。可见只看统计数据和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有时会导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孰是孰非，应该是很清楚的。

统计方法也有运用得好的，但比较少见。例如李战（1997）对《红楼梦》前80回中“便”和“就”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统计，不仅把各回分开统计、对话体和叙事体分开统计，而且把不同人物的对话也分开来统计，结果就有了有意思的发现。先看两个统计表（表2、表3）。

表2 “便”“就”总数

	叙 事	对 话	总 计
便	3119	287	3406
就	343	1789	2132
总计	3462	2076	5538

表3 8个人物对话中的“便”和“就”

人 物	便	就	便 / 就 之比	人 物	便	就	便 / 就 之比
贾宝玉	28	195	14.3%	贾 琏	2	39	5.1%
林黛玉	9	73	12.3%	袭 人	10	70	14.2%
薛宝钗	24	114	21%	李嬷嬷	0	6	——
贾 政	8	12	67%	赵嬷嬷	0	7	——

表2显示，“便”和“就”在叙事部分和对话部分的出现数量正好相反，对话中“就”的数量是“便”的约6倍，而叙事部分则“便”是“就”的近10倍；如果只看全书的出现总数，则“便”比“就”多出1000多例，这显然不能反映口语的真相，口语的实际情况理应主要看对话部分。表3对不同人物的对话分别进行了统计，更有意思（原文统计了20个人物的数据，这里仅选取其中8位）：上层人物、封建卫道士贾政的对话中，“便”和“就”之比高达67%；而不识字的底层人物李嬷嬷和赵嬷嬷说话时都只用“就”，根本不说“便”，这才是当时老百姓日常口语的真实反映！据此我们可以做出推断，在当时的实际口语中，“就”对“便”的替换已经基本完成。其余人物对话中这两个词的使用情况也值得细细玩味，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用词的匠心。

更细致的分析是把听话人也分开来统计,比如平田昌司先生(2008)“四《醒世姻缘传》里的否定副词‘不曾、没’”就通过两个统计表把说话者和听话者分性别进行统计,结果发现,“‘不曾 VP’和‘没 VP’的选择,跟小说人物的男女性别有很明显的关系”,又通过其他角度的分析,得出结论:“‘不曾’偏于‘外言’,‘没’偏于‘内言’。”这样细致入微的分析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

可见运用统计方法需要注意两点:一是所选的语料应该尽量具有同质性和可比性(包括篇幅大小的对等性);二是在选取的语料文白混杂、性质不一的情况下,对统计数据要做分析,切不可把复杂的语料“一锅煮”,简单化地出一个统计数据就匆匆得出结论。太田辰夫先生(2003:374)说过:“处理中国古代文献是极为困难的。”这是经验之谈。

4. 重视典型语料

所谓“典型语料”,就是能够真实反映口语面貌的语言材料,包括成篇的文本和“剥离”出来的口语性语例。

我们认为,在反映口语真相方面,典型语料的价值有时远远大于一堆未做分析的统计数据。^①“一些高度口语化的语料可以作为我们推定替换过程完成与否的有效依据,……这种作品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宝贵材料。”(汪维辉,2000:405)

比如西汉王褒《僮约》:“读券文适讫,词穷咋索,伋伋叩头,两手自搏,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审如王大夫言,不如早归黄土陌,丘蚓钻额。早知当尔,为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恶。’”目泪、鼻涕做清楚的分别,这是第一次见到(《汉语大词典》“鼻涕”条即引本例为始见书证),反映了西汉口语的真实情况。众所周知,先秦汉语眼泪一般叫“涕”或“泣”,鼻涕叫“泗”,如《诗经·陈风·泽陂》:“寤寐无为,涕泗滂沱。”毛传:“自目曰涕,自鼻曰泗。”而《僮约》中的这一典型语例^②确切无疑地告诉我们:至迟在西汉后期的口语里,眼泪已经叫“目泪”、鼻涕已经叫“鼻涕”了。(汪维辉,2006:506)假如我们调查一下同时期的其

① 汪维辉(2000:404)曾经以“入/进”为例说明过这个道理,可以参看。

② “典型语例”一词系真大成博士所创用。

他语料，这样的典型语例是找不到的，即使是像《史记》那样语言相对浅近的作品，虽然出现了2例“垂泪”，但是没有“目泪”，39例“涕”则都是指“眼泪”，无一指“鼻涕”。事实上经我们初步检索，整个两汉魏晋南北朝的中土文献中“目泪”也没有发现第二例，只是在翻译佛经中时有所见。这可能跟单、双音节有关，因为从理论上说，西汉口语中眼泪既然早已可以叫作“泪”（汪维辉，2000a：33），那么跟“目”组合成双音词“目泪”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目泪”并没有比“泪”提供更多的信息，因此在以单音词为主导的文言作品中“目泪”很难见到也是情理中的事，翻译佛经可以反证这一点。《僮约》中“目泪”与“鼻涕”相对，都是双音节、偏正式，因此出现“目泪”一词大概主要是语用因素在起作用。^①

仅仅根据少数几种（有时甚至就一种）典型语料就得出结论，这样的方法是否太大胆太武断？请允许我们打个比方：在长白山上看天池，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云雾迷茫，看不真切的；只有偶尔云消雾散，才能一睹真容。能看到真容的时间往往非常短暂，甚至就是瞬间，但是我们相信，这才是天池的真面目，而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所看到的仅仅是它的假象。由于历史语料的复杂性，我们常常只能通过典型语料一窥古代口语的“真容”，就像看到真正的天池一样。

由此我们提出，汉语史研究中是否可以确立这样两条原则：

（1）以典型咳非典型。即：在典型语料能够证明某一事实的情况下，其他非典型语料所提供的反面证据一般可以不予采信。

（2）以前期咳后期。即：某一事实在前期已经得到证明，则后期的反面证据可以不予采信，因为按照一般逻辑，某一种语言现象只会按着既定的方向向前发展，除非有特殊的原因，不会逆转。

这两条原则主要是针对汉语词汇史和语法史研究而言的，不过我们相信其基本原理同样适用于语音史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这两条原则只适用于同一

^① 匿名审稿人指出：“孤证很难排除是作者母语方言的特殊影响，造成其他方言区作者很少使用。文中以《僮约》‘目泪’为例说明即使同时代的孤证也足够有力。假如同时代其他文献几乎看不到此词，不能完全排除其为方言词的可能。即使后代此词用得广泛，也不排除当时尚是方言词，以后逐步扩散的可能。”从广义上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目泪”的情况我们以为可能还是这里所分析的可能性更大。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提醒。

个语言（或方言）系统的共时状态及其连续性演变，而不能用来解释不同方言之间的共时差异或不同语言（或方言）系统各自独立发展的历时演变，这是不言而喻的。^①

三、语料使用举例：关于系词“是”何时发展成熟的讨论

下面我们以如何判断系词“是”是否已经发展成熟为例，对上文所论及的与语料使用相关的各种问题做一总的说明。

董守志（2011）主要从“不是”对“非”的替换来讨论系词“是”的成熟问题，这比以前仅仅依据“不是”的出现（如汪维辉，1998）或“不是”取代了“非是”（如唐钰明，1992）就判定系词“是”已经发展成熟要更加全面、深入，把研究推进了一步。

董文的结论是：“系词‘是’的成熟时代应该是在元末明初。”我们姑且相信这一结论（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讨论）。他赖以得出结论的唯一依据是：《老乞大》《朴通事》中表示否定判断100%都用“不是”，没有“非”“非是”“未是”。

应该说《老乞大》《朴通事》是典型语料，它们反映了真实口语，董文的依据是站得住脚的。那么《水浒传》等同时期语料所提供的反证就不足以推翻这个结论，比如《水浒传》（100回本）中“不是”200见，“非”134见（其中有些并非“不是”义，应予排除，下同），“非是”32见，“非”和“非是”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就是“以典型赅非典型”。

同样的，之后的《红楼梦》中这组词的数据也不足以动摇这个结论：“不

^① 匿名审稿人指出：“原则一‘以典型赅非典型’理论上可以成立，但是文中认为典型材料有时即使只有一条孤证也足够有力，可以排除非典型的大量语料，这或许有风险。除了版本等方面原因带来的孤证的风险，还应该考虑到汉语分布区域辽阔，地域差异自古就有。……对汉语来说，绝对纯的单一系统的语料很难找，尤其是本文作为重点的口语体材料，很多口语化语料都带有作者的地域方言要素，这使得原则一的采用不能太过强大、毫不受限。”这一提醒完全正确，可以纠正原稿的偏颇，笔者深表感谢。

是”158见，“非”178见。这就是“以前期赅后期”。

之所以不采信《水浒传》《红楼梦》这些反证，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相信《老乞大》《朴通事》所反映的才是真实的口语状况，就像偶获一睹的天池真容。

事实也确实如此，试以《红楼梦》第一回为例。该回中“不是”只有1例：“那道人道：‘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脱几个，岂不是一场功德？’”而用作否定判断的“非”却有11个（例略）。如果只看出现次数，我们一定会认为，在《红楼梦》时代，否定系词“不是”非但没有成熟，甚至还可能仅仅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呢！可是董文根据《老乞大》《朴通事》的材料得出的结论明明是“系词‘是’的成熟时代应该是在元末明初”，难道过了将近四百年又倒退回去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其实稍作分析即可明了，这些“非”并不反映真正的口语，尽管半数以上的例子出现在对话中。^①即使到了现代汉语，表否定判断的“非”仍可单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非”字条说：“④动不是：答～所问|此情此景～笔墨所能形容。”标注了词性，说明《词典》认为这个“非”是个可以独立运用的词，所举例子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能否据此就说直到现代汉语“不是”还没有完全代替“非”、系词“是”还没有完全发展成熟呢？显然不能，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非”在实际运用中是高度受限的，一般情况下，现代汉语口语要表达否定判断都得用“不是”。

现在回到董文的结论。对于这个结论，可能很多同行都会觉得难以认同，因为这跟之前的唐代说（唐钰明，1992等）和东汉说（汪维辉，1998）时间差得太远，也不符合汉语史研究者的一般语感。

我们认为董文在语料的选择上存在缺陷，又未对所选语料做具体分析，只相信统计数据，因此导致结论存在严重偏颇。通过对唐代一些典型语料的考察，我们认为至晚到中唐时期“不是”已经在口语中基本取代了“非”，系词“是”已经发展成熟。下面试作论证。

进入唐代，否定判断句有两个重要的变化。

^① 对话并不都是口语。太田辰夫先生（1991：189—190）指出：“清代作品中，试着翻一翻《红楼梦》就可以知道，那里面女性和小孩和奴仆人等使用地道的俗语，与此相反，北静王和贾政及其他贵族士大夫们在正式场合所作的对话非常接近文言。”

一是在一些口语性语料中，“不是”超过了“非是”成为“F是”^①的主流形式。这一点比较容易判定，只要看一看表4的统计数据即可明白。

表4 唐五代“F是”的使用情况统计表

F是	文献	五经正义 ^②	义净译经	王梵志诗	游仙窟	李白诗	杜甫诗	敦煌本六祖坛经	白居易诗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敦煌变文	祖堂集
非是		261	191	1	0	1	1	0	2	0	18	6
未是		40	3	2	0	0	1	0	4	1	2	11
不是		78	59	4	5	3	10	7	36	2	89 ^③	203

二是“不是”对“非”的替换至晚在中唐以后的口语中已经基本完成，而不是如董文所说的晚至“元末明初”。要确认这一点难度较大，光看统计数据不能说明问题，必须借助过细的语料分析（表5）。

表5 隋唐五代“F是”与“非”的使用情况统计表

词项	佛本行集经	王梵志诗	游仙窟	白居易诗	敦煌本六祖坛经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敦煌变文	祖堂集
F是 (不是) ^④	60 (0)	7 (4)	5 (5)	42 (36)	7 (7)	3 (2)	105 (89)	220 (203)
非	143	5	15	173	9	5	64 ^⑤	189 ^⑥

从表5可以看出，王梵志诗中“F是”已略多于“非”，“不是”和“非”的数字也已十分接近，到了敦煌变文和《祖堂集》中，无论是“F是”还是“不是”，都已经超过了“非”，成为否定判断词的主流形式，特别是在敦煌变文中，“不是”

① “F是”是“否定副词+是”的总称，包括“非是、未是、不是”。

② 我们的统计数据与董文略有出入。

③ 有5例重复出现于“不是寻常等闲事，必作菩提大法王（或‘必作无上大法王’）”中。

④ 括号内是“F是”中“不是”的出现次数。

⑤ 另有1例引《维摩诘经》“此非我宜”（《维摩诘经讲经文（五）》），1例引《撰集百缘经》“非是帝释，亦非梵天鬼神大将”（《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

⑥ 另有10例，或引用前代佛典，如《因果经》《普曜经》等；或引用古书注解，如《山海经》郭璞注；或引用古语；等等。